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余 虹

艺术与精神



社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主编 / 张志扬 余虹

余 虹

艺 术 与 精 神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艺术与精神/余虹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12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ISBN 7-80149-446-6

I . 艺… II . 余… III . 文艺理论 - 文集 IV . 1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5416 号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艺术与精神



丛书主编: 张志扬 余 虹

著 者: 余 虹

丛书策划: 吴伯凡

责任编辑: 胡 琴 张 敏

版式设计: 辛 诉

责任印制: 同 非

出版发行: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3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 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科技印刷厂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32 开

印 张: 12.7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9-446-6/B·069

定价: 24.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

总序

南冥有木，彷徨 乎无为其侧

我们经历的变化，恐怕算得上 3000 年之衰变：从有“辉煌”历史的封建社会向没有“辉煌”历史的现代社会转变。有人言，一个人的成长期要缩影般地重现他的史前史。又有人言，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这两句话似乎特别适合 20 世纪 100 年。也就是说，只要活在这个世纪，漫长中国历史也就在将来机缘的吸取中都活过来了，可以成人。我们是有幸的。

然而，那么多仁人志士，在文化史上所留给我们的记录，问题轻重结论，责任消长磨难，如此周期失衡以至我们不敢做传火之薪窃仁人之名，只有退避天涯以求偏隅之安，把“学问”二字做成“贴己”而已。

所谓“贴己”，不是“私房话”，说得雅一点，叫“私人语言”，不是；也不是“贴身”的“绝活”，像武林秘笈；而是“由着性子做”。

【海南大学人文丛书】总序

海南地处边缘，有意外的人文性质，重力不重，气压不压，阳光、沙滩、海浪，净化着文明的烟尘，少许些技术僭越的骄狂，也少许些历史怀古的忧伤，没有亡灵的召唤，没有寒热的激情，没有牡丹芍药国色天香，没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没有泰山极顶东临碣石，没有暗香浮动疏影横斜，没有萧墙刀光古刹钟声，没有小桥残阳流水人家……命脉浮浅，国粹稀薄，伤春悲秋，都不是时候，省了许多牵挂。虽然我们不是图这而来，自然的清新空气，或许淡漠了盘根错节的历史底蕴，倒也疏朗了一点思想的骨架。

“地缘学”是近千年兴起的。西方有海洋文明与土地文化的分别，直到今天，“海洋”仍然是冲淡“土地与血”的潜在抗体。

中国则早有它的属性意识：“仁者爱山，智者爱水”。儒家是仁者，志在庙堂之高；庄周恐怕要算智者了，常在南冥秋水之间。

这些我们都无法说。此次海南大学决定人文学科集结首批“丛书”，虽有地缘的形式，却很难说有地缘的特征。如果硬要说点什么，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贴己”。学问有多种做法，怎么做，全然是各人自己的事；没有受命没有传承没有挂碍的自主姿态倒是共同的。

例如，在文艺学领域，从古典文献到现代文论，从文字触觉到精神生态，各自的伸展，都有别人不到之处。

张三夕的《通往历史的个人道路》，按作者的说法，主要点不在于“铺摊子”——校讎学、文学史、史学史、思想史，都有案头功力的磨砺与学理的铺陈；而在于“收摊子”，即借鉴西方学术思想的方法，激发对永恒的无穷无尽的生活之流提出新问题的能力，以便在国学的根底上，写一部由问题意识引导的有“个人视角”、有“思想”的思想史。

艺术与精神 · · · · ·

余虹的《艺术与精神》，提出文学艺术在现代生活中越来越无足轻重，精神品质几乎丧失殆尽，这究竟是现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需要警惕的病症？为了探寻当代文艺的精神性失重的根源，作者清理了三条道路：①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②中国20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③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谨作为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鲁枢元的《猞猁言说》，集中呈现了作者一贯锐意探索开拓的足迹：从80年代中期的“创作心理”、后期的“文学言语”到90年代的“精神生态”，或者说，从“向内转”到“超越语言”到将“精神因素”引入地球生态系统以期为人类面临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寻求新的拯救之途。每一步，可以说都是对当时社会惯性的偏斜，像伊壁鸠鲁的“自由原子”。

耿占春的《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是“一场诗学与社会学的内心争吵”的集语。作者暗中渴慕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然而又只是一种有限个人的话语的写作，因此也是与“一个”、“日期”、“一种语言”、“一个自传式的署名”分不开的，在最简要的自传文字中能够收集到历史、理论、语言学、哲学等文化的最大潜能。这未必只是使作者发生兴趣的梦想地。

又如，在哲学领域，从中国传统哲学的现实关切与开拓，到西方现代哲学的汉语解殖与言说，各自的探寻，也有别人不到之处。

曹锡仁的《中国问题散论》，从80年开始，最初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由此追寻其形成的社会历史根源，进而把中国文化的选择和社会发展的模式作为新的研究起点，正好表达出关切中国现代命运的人文学者治学的价值取向。

“中国问题”不仅仅是外国人研究中国的提问方式，也不单纯是政府高层的决策专利，它必须融入专业学者的独特视野，才能合理提供坚实的社会体察与学理根据的保证。

萌萌的《情绪与语式》，让我们看到，莎士比亚悲剧、易卜生悲剧、贝克特以及现代日常悲剧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情绪”，如何在不断地挣脱历史理性的定式寻求自己生成着的表达。这种“断裂的声音”之捕捉早在80年代中期就逼使作者转向现象学与欧陆语言哲学，而且还要反省作为“身体”物性的“二重情绪”同“三类语式”的交互共生性，以通往公共语言何以作个人表达的可能之途。

陈家琪的《经验之为经验》，是对我们最“上手”几乎构成我们生活的“经验”不断流失以至于变成苍白这一事实“震惊”后的思索。于是重提康德式的问题“经验何以成其为经验”与海德格式的问题“作为经验的经验是什么”。作者要像胡塞尔“面对事物本身”样的“面对经验本身”。“经验”不能按已成知识的“经”（在先）与“验”（上手）的相互匡合来理解，经验的普遍性只能在经验自身的构成（生成）中获得描述。

张志扬的《现代性理论的检测与防御》，呈现了“1989～1999”十年的主要问题与思路，其实说起来只一句话：“如何走出‘只准这样，不准那样’的本质主义与‘怎样都行，怎样都不行’的虚无主义的循环”。提出被还原了的“偶在论”，不过是一种尝试，也还只是消极的检测与防御，对包括哲学在内的现代性理论思考，只能算作前提性的准备。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技术的图象，以至我们的思维也开始在数码与图象之间训练有“数”。或许工于计算的人有福了。

幸好人是隐含否定于自身的偶在者，他一方面要接受数

码与图象的度量而不得不规范化，另一方面，他又难免例外地要承受大地与苍穹的跨度，使那想象的空间连人不可兼并不可让度的隐私，终究守护着人可偏离的自由。或许善于例外的人有福了。

生长并传播教育的教育之地，现在有最功利的企图，没有比这更跛足短视的不幸。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以为它能靠自身的自然增长而脱去科技神话的巫魅。可是它们忘了，它们的“不完全定律”是不可能为自己寻找到“第一推动力”的，无论是宇宙的内和外。

海南的信使，但愿他有幸从世界与世界的空隙中走来，只需带着清新的空气。我们感谢这一片土地。当然也感谢海南大学注视文科的精神——“山不在高，有神则灵；海不在深，有珠则润”。

“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这些路叫林中路。每人各奔前程，但都在同一林中。常常看来仿佛一个人的情形和另一个人的情形一样。然而只不过是看来仿佛如此而已。从事林业者与森林管理员认得这些路。他们懂得什么叫做误入歧途。”

相对那些自明的“高速公路”，“林中路”常常是“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

或许，这正是我们向往的吧。

“南冥有木，彷徨乎无为其侧”。

序

在当代生活中，文学艺术越来越无足轻重，这倒是应了黑格尔一百多年前的预言“艺术终结了”，尽管当代文艺的失重并不在黑格尔的意义上。当代文艺愈来愈彻底地融入大众文化工业，成为日常消费的一部分，其精神性品质几乎消失殆尽。于是，在当代情境中，思考文艺问题就显得落后而迂腐。

问题在于：文艺失重并不就是天然正当的事实，它究竟是这个时代引以为荣的标志，还是一种需要警惕的病症，尚需深思。

在我看来，文艺失重乃是虚无主义统治的症候与结果。虚无主义拒绝任何精神价值，它只认可物的存在。为了进入当代虚无主义的物化乐园，文艺放弃了自己曾经有过的精神性立场，然而，正是这一放弃使文艺丧失了自身。其实从根本上说，文艺失重不过是当代人放弃精神性存在的症状之一。

问题在于：物化生存是否幸福？虚无主义是否是人的宿命？或者，精神性的生存可能吗？人能放弃这种生存吗？如果答案并不天然自明，当代文艺的失重就值得深思，进而言之，在当代情境中思考文艺问题（尤其是以一种非当代的方式）就不单是一个文艺学的问题更是生存论的问题。

序 ······ 艺术与精神

这大概是多年来我一直追思文艺问题的深层根由。

由于当代文艺及其理论的物化品质已深蔽了文艺及其理论曾经有过的精神性品质，所以，我被迫在过去的文艺之思中去寻找思考文艺之精神性品质的路标。

如此这般的返回之路确如海德格尔说的“林中路”。“林中有许多路，这些路多半突然断绝在人迹不到之处。”于是，我总在一些绝路处回头，艰难的跋涉多为徒劳。有幸的是，回头是一种警示：此路不通，必须另择一路。终于有一些不绝之路引我前行。

本文集的 A、B、C 可谓三条不绝之路，至少目前我还未看到其绝处。

“A”：中国 20 世纪文艺革命的道路。此一道路虽歧路丛生，艰难曲折，但亦不乏边缘小道的绵延不绝，其精神性踪迹还依稀可辨。

“B”：西方现代艺术之思的道路。这一路关于艺术自主性的追思源于个体精神性生存的领悟与坚持，尽管其入思的本源往往被笼罩在现代性的层层表象之中。

“C”：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比较研究的道路。在同一和差异之间可见中西文艺之思的限度和尚未开启的道路。

沿上述三条道路返回过去的文艺之思是要找到今天思考文艺之精神性品质的路标，因此，我更关注曾有之路的界限（检审既有文艺理论的思想基础）。界限之标划乃越界之前提，而界限内外的“之间”正是未来文艺之思的路标。

目 录

序 / 1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素描 / 3

“现实”的神话：革命现实主义及其话语意蕴 / 24

解构批评与新历史主义

A

——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 / 88

中国古代诗文论的实用与审美之维 / 131

神·语·诗：海子及其他 / 154

中国艺术现代转型的问题 / 167

B

从工具性到自主性：西方艺术之思的美学

转向 / 187

目 录

B

- 个体启蒙与艺术自主
——法兰克福学派的艺术理论 / 218
德里达：文艺再现论之解构与文学规约 / 239
“荒诞”指述 / 269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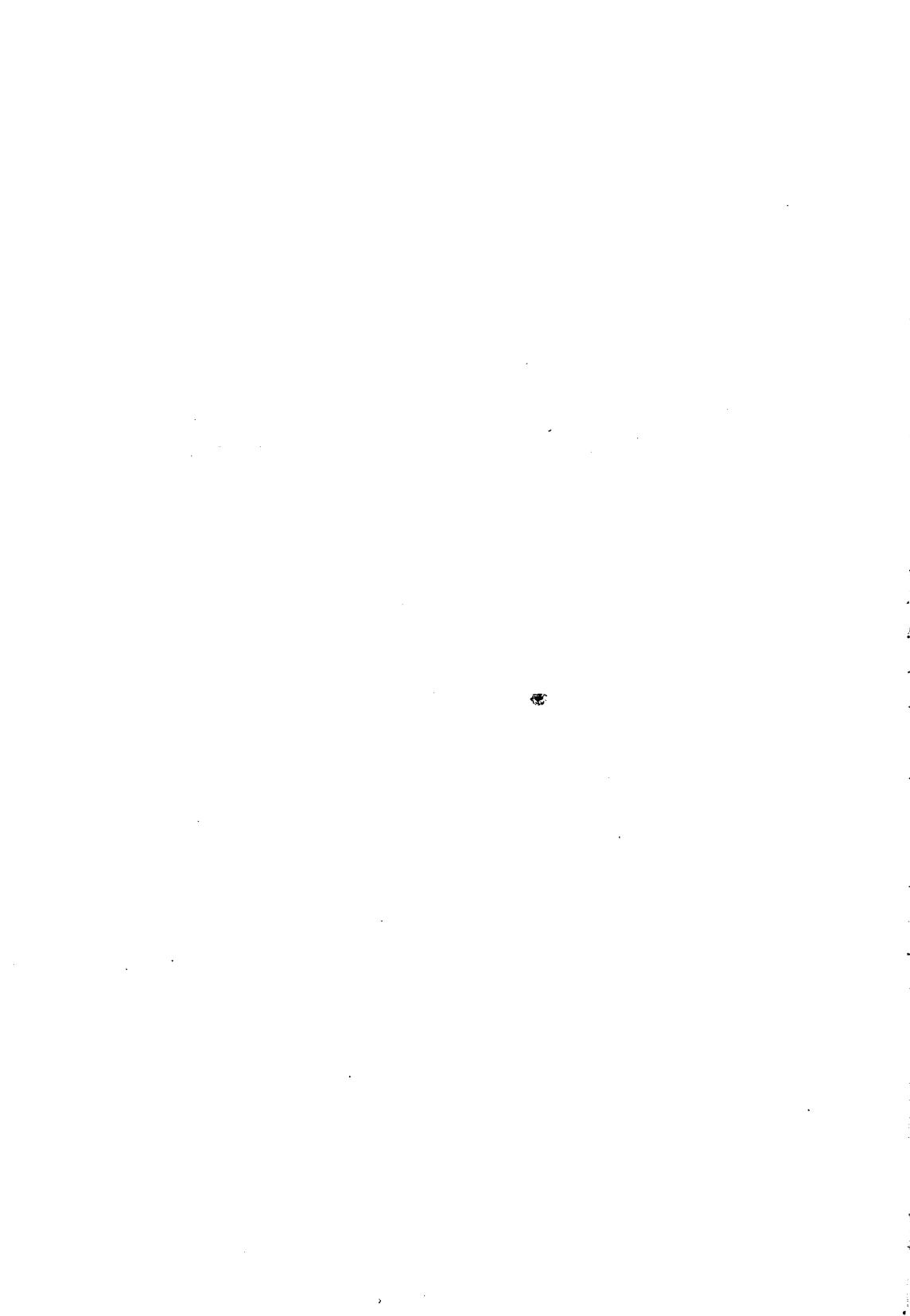
C

- “中西比较诗学”：其名其实？ / 293
文史哲：中西叙述理论及其知识眼界 / 300
文论诗学的生存论立场与二元紧张 / 319
中西艺术：世界·大地·之间 / 348
奥斯维辛之后：审美与入诗 / 367
-

后 记 / 390

--A--

2



中国文学理论的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素描

一、中国语境与思的路标

“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两大术语的语用十分复杂，必须加以限定才能成为反思文学理论的路标。一个了然的事实是：文学理论是话语而非其他。当这两大术语用于话语分析时，它们提示的是两大话语类型。“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描述一种本体论的、目的论的、决定论的元话语品质，以及由此推论派生的其他话语实践的品质。现代性话语实践的背后是历史理性信仰（相信历史是一种有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时间序列）和语言理性信仰（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其表现形态是意识形态化的历史大叙事。“后现代性”术语被用来描述一种质疑、批判、解构现代性话语之理性神话的话语品质，以及在后现代氛围中建构非本位主义、非决定论和非目的论之历史小叙述的话语实践。

由西方引入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术语还必须在中国语境中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处理才能成为反思中国文学理论的路标。与西方不同，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党国一体化的中国式政党实践，西方“现代”的动力基础

艺术与精神

则主要不是政党实践，尤其不是这样一种政党实践。有人对列宁主义政党和议会政党作了区分。他们认为前者是意识形态认同集团，后者是政见认同集团，前者以对宏大的意识形态认同的方式来组织动员党员群众，形成革命队伍，以所认同的意识形态为思想纲领，并由之推导制定具体的行动策略；后者则以具体政见认同组织动员党员群众，形成议会斗争中支持政党政见的队伍，以所认同的政见为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和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列宁主义政党，前者以马克思主义为其认同的意识形态，后者以三民主义为其认同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实践中的意识形态认同是关键之关键，而为达到这一认同所进行的意识形态教化（思想教育）则是其首要任务。^①我所谓的“中国式政党实践”指的就是以列宁主义政党方式行动的政党实践。而就中国“现代”的生成而言，共产党的实践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式“现代”的现实样式就是共产党1949年革命成功所建立的“新中国”。相比之下，西方“现代”的生成与政党实践并无直接关系，因此对中西之不同“现代”的考察应取不同的路数。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由中国式政党实践导致的全方位的高度整合（社会、观念、心性的被组织化）乃中国式“现代”的根本规定性，如此之“现代境遇”是理解一切中国式“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现代性问题）和“后现代现象”（包括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问题）的起点与基础。

20世纪中国式政党实践（主要指共产党的实践）分为

^① 请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开放中的变迁》第六章，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

两大阶段，这两大阶段分别依托于两大话语和两种策略。与理解中国文学理论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是政党实践中意识形态话语的位置。第一阶段（五四后——“文化大革命”）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以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为手段（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主要包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叙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和人类解放的叙事，这套叙事依托本质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历史理性信仰以及客观再现性的语言理性信仰而成为不容质疑的真理性元话语。列宁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学说作了修正之后（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贬义概念，它指虚假意识，与“科学”相对；而列宁则认为不能将所有的意识形态看作虚假意识，有些意识形态真实地反映了客观规律，因而是科学的意识形态），称马克思的学说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是首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群众，将工人群众组织成有觉悟的革命队伍，以便实施意识形态提出的目标。在此，意识形态教化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因为在列宁看来，在工人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后——）为政党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经济建设以实用主义的现代化整体叙事（意识形态话语）为基础，以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为手段。实用主义的现代化整体叙事可概之为“发展是硬道理”的“猫论”，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行动策略可概之为默认大众意识形态和有限度地控制精英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一时期，针对大众的意识形态教化已无必要，因为实用主义的现代化叙事与大众自发产生的实用主义态度一拍即合（不像政治革命时